

“辽三彩”：釉彩涅槃鸣华夏，繁华渐显褪凡尘

■钱国宏

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,“唐三彩”是耳熟能详,但若是提到“辽三彩”,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其实,辽三彩和唐三彩一样,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,均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。

公元916年,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——辽,这个由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吸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,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系列灿烂文化。其中就包括“辽瓷”(陶)。辽代烧制的各种陶器,由于受当时的材料、工艺等影响和制约,尚属于一种低温彩色釉陶制品。这些陶制品多用黄、绿、褐三色釉,且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技法,故史学界、考古界称之为“辽三彩”。

辽三彩最早烧制年代始于何时,目前国内尚无确切证据可考。但从有确切年代的墓葬出土的器物中,发现在辽穆宗应历年(公元951-969年)以前就已有了黄、绿单色釉陶器,可以断定这时已经有三彩陶器。辽代三彩承袭了唐代传统,是接受唐三彩传统的一种低温瓷釉陶,胎质粗而较硬,呈灰黄白色或淡红色。

虽然都是由三彩绘成,但辽三彩和唐三彩从胎土到色彩还有釉面的润泽度等均有明显区别。另外,辽三彩还具有四个特点:

一是注重民族性。辽三彩的器型普遍较小,鲜有唐三彩中的骆驼那么大的器型。常见的器型有穿带壶、龟形壶、兔形壶、鸡冠壶、海棠式长盘、莲花式碟、印花暖盘、三角形碟等,近年来也出土了少数较大的佛



辽三彩鱼形壶 故宫博物院藏

像。这些器形的纹饰、造型等均具有浓郁游牧民族生活气息,和强烈浓重的契丹民族特色。

二是注重实用性。辽三彩的器型多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,更侧重于实用性,其器型基本上考虑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,如辽三彩中常见的马镫壶、葫芦穿带瓶、印花奔纹扁壶、口部外翻的大罐等器型,都便于当时的人们日常携带和迁居搬挪。

三是注重艺术性。辽三彩烧制技术独树一帜,瓷质精细,莹润如脂,平滑光亮;釉色斑斓,色泽鲜艳,挺拔俏丽。纹饰精良而奇巧,采用划花、印花和贴花三种艺术手法,纹样以花草虫鱼为主,尤以牡丹、莲花、宝相

花、蜂、蝶、水纹、草花纹、双鱼纹等为多见。其精彩、精湛、精良的纹饰,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四是注重创新性。辽三彩在造型上不落窠臼,大部分器型突破了前朝的体例,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粗犷豪放、不拘一格的风格。器物饰纹颇具动感,增添了器物的艺术美感。同时,辽三彩的器物上大都带有鼓钉纹、双系纹等装饰,较之前朝的三彩器具,更具美观和厚重。

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内的辽三彩釉鱼形注壶,是“辽三彩”中分量较重的作品,此壶高15厘米,口径5厘米,底径7厘米,壶为鱼形,鱼嘴为壶流,背部有一喇叭状菊花形注口,鱼背一侧为提梁。鱼腹下饰一荷叶,托举整个鱼体,底部为平底实足,施黄、绿、白三色釉彩。整体造型饱满,鱼似在摇首摆尾,喷吐水花,一副悠然自得之态。此壶集模印、贴花、堆塑、刻画于一体,制作难度较大,为辽三彩中的精品。

收藏唐三彩者,趋之若鹜;收藏辽三彩者,寥若晨星。欣慰的是,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收藏人士开始认识到“辽三彩”的重要地位,国内现今的许多收藏类节目中,也都出现了“辽三彩”的身影。辽宁博物馆等专业馆藏部门,也都相继推出了“辽三彩专项展览”,为“辽三彩”擦去了岁月的蒙尘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“辽三彩”会和唐三彩一样,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史料价值,在我国陶瓷发展史和收藏界,绽放异彩。

丰子恺白画像里的“玄机”

■雷克昌

丰子恺的《若有所思》,作于1947年10月,是画家用纯白描手法勾勒的一幅自画像。由丰子恺的得意门人胡治均所收藏。

细观此幅画像,发现其左下角除注明作画时间外,还签有“Tk”字样。“Tk”是“子恺”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“zk”的别写。丰子恺采用的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罗马拼音的注音方式,汉语拼音的“z”用罗马拼音写作“Ts”,于是丰子恺就用“Tk”作为“子恺”的拼音缩写,用于作品的落款。1924年,丰子恺用“Tk”的落款,在《我们的七月》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当时丰子恺只有27岁,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。打那时起,他作品画面上都有“Tk”的落款方式。不同的是,在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画面上的“Tk”加了一个圈,其后作品中的“Tk”,则不再画圈,只顺手写在画面的某个角落,这也成为鉴定其作品真伪的一个依据。

这幅自画像,是画在“缘缘堂画笺”上的。“缘缘堂”丰子恺的斋名,系他的老师李叔同所取。丰子恺于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一师,师从李叔同学习图画和音乐,并在课余向李叔同学习日文,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1918年李叔同剃度,落发为僧,出家后的法名为弘一法师。1926年秋天,弘一法师云游上海,其时丰子恺已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,寓居在上海江湾永义里,弘一法师便在昔日学生丰子恺家中小住。一天,丰子恺雅兴大发,想给自己的书斋取个斋名,弘一法师让他裁出许多小方纸片,每个纸片上写一个自己喜欢的字,然后搓成小纸团,撒在佛陀画像前的供桌上,任取两个作为搭配。结果,丰子恺连抓了两次,都是“缘”字,书斋遂以“缘缘堂”为名,并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“缘缘堂”的横额,装裱后挂在永义里的寓所。以后丰子恺每迁居哪里,横批便挂在哪里。

1933年,丰子恺在家乡浙江桐乡县石门镇建造缘缘堂新屋,因弘一法师题写的横额太小,遂请马一浮



丰子恺 若有所思

为宅院重新题写“缘缘堂”斋名。丰子恺对缘缘堂情有独钟,他的绘画用纸和书信的用纸上印有“缘缘堂画笺”和“缘缘堂信笺”字样,他的不少文章和出版物都跟“缘缘堂”有着不解之缘。1937年11月,缘缘堂毁于侵华日寇战火,流亡在江西萍乡的丰子恺得悉后,奋笔疾书了《还我缘缘堂》《告缘缘堂在天之灵》《辞缘缘堂》等文章,愤怒斥责日军暴行。抗战胜利后,丰子恺曾返回故乡凭吊缘缘堂旧址,并画下了一幅残垣断壁的漫画,上题“昔年欢宴处,树高已三丈”,流露出内心对当年缘缘堂的怀念。现在的缘缘堂,是1984年桐乡县人民政府在原址按照原貌重建的,堂额照马一浮原迹复制。

自画像右侧,钐有一方阴文印章,印文是“弟子胡

治均读”。胡治均生于1921年,浙江宁波人,寓居上海。1947年经友人介绍认识丰子恺,结为忘年之交,遂向丰子恺学画学书,成为丰子恺的嫡传弟子。胡治均有一方常用印章,印文就是“缘缘堂门人”。其字画酷似“丰门”,几乎可以乱真。胡治均也是丰子恺绘画的收藏者,数量300多件,尝以“三百丰画富翁”而自豪。“文革”中胡治均遭难,这批藏画,随之遭毁。1969年胡治均被“解放”,立即来到丰子恺陕西北路“日月楼”住处,互问安危后,胡治均沉痛诉说画稿遭毁始末,并说:“我不争气,没能把先生的作品保住,我对不起先生。”丰子恺深知“文革”为祸之烈,遂劝慰胡治均曰:“我不死还有手,我会给你再画的!”1971年秋,丰子恺重画旧作数套,亲自用牛皮纸糊制了一个大袋子,题“敝帚自珍”“交治均藏”等字样。并作《敝帚自珍序言》一文,文中称这批作品“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,因名之曰《敝帚自珍》交爱我者藏之,今生画缘尽于此矣。”以此为终点,丰子恺就此封笔,一代艺术大师就此结束了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。

这张自画像中的丰子恺坐在藤椅上,左手握着书卷,右手捂着嘴,若有所思,且愁眉不展。这与丰子恺平日那种和蔼可亲的豁达开朗、幽默怡人的形象大相径庭。说来也并不奇怪。因丰子恺患有严重的牙周病,常被牙疾困扰得寝食不安。1947年12月,经许钦文介绍,前往杭州易昭雪牙科拔掉了17颗龋齿。手术进行顺利,获得成功。丰子恺为此专门写了《口中剿匪记》一文,文中把他的17颗病牙,比方为一群匪,于是他任命易昭雪为口中剿匪总司令,向口中进攻,苦战11天,终于连根拔起,满门抄斩。丰子恺还把这篇文章写成横幅,用金绫装裱送至诊所,易昭雪如获珍宝,挂在诊所显眼处。1948年花朝日,是丰子恺夫妻银婚纪念日,丰子恺在西湖“楼外楼”举办家宴,不请外客,单请了牙医易昭雪。而丰子恺和易昭雪,也结成了忘年之交,传为佳话。